



郭绍明 著



吏为民之役

——柳宗元论集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吏为民之役
——柳宗元论集

郭绍明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吏为民之役：柳宗元论集 / 郭绍明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495-6664-8

I. ①吏… II. ①郭… III. ①柳宗元 (773~819) —
思想评论 IV. ①B24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802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6.125 字数：170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唐代著名思想家、改革家、文学家柳宗元(773—819)在其一生中写了大量理论著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学思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柳宗元的理论,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剔除其糟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去分析,柳宗元思想中对我们今天特别有意义的是他关于“吏”、“民”关系的论述。在距今 1100 多年前,柳宗元就非常清晰地揭示了国家官吏与黎民百姓的关系。他提出吏“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送薛存义之任序》)。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能够提出在现代社会仍然未失其意义的观点,确实很了不起!要知道,柳宗元所处的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而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是等级体制,管理社会的官吏是由皇帝任命的,不是老百姓选举的,是“人上人”,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柳宗元冲破了等级制度的传统观念,将吏民关系做了一个惊人的颠倒!柳宗元说:“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送薛存义之任序》)如果你雇请一个人到家里帮你干活,他拿了你的钱,却不好好干活,还偷你的东西,你必然很恼火而且处罚他,把他赶走。“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如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送薛存义之任序》)现在类似这样的事很多,而老百姓不敢发泄他们的愤怒,也不敢处罚那些拿了钱又不好好干活的人,为什么?形势不同。形势不同而道理却是一

样的，我们的老百姓会怎么样呢？假如明白了这个道理，能不感到恐惧害怕吗？柳宗元提出吏为“民之役”，就是现代说的“公仆”，比西方早了1000年。他还没提到皇帝也是民之役，这一思想由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提出。可见柳宗元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100多年后的今天，读着柳宗元的这些文字，我们依然感到心灵上的震撼！

关于权力的来源，中国三代之前是“天下为公”的公天下，三代开始进入“天下为家”的家天下。有了家天下，才产生信仰。大禹因为治水有功，受到尊崇；商汤由于宽容，受到尊崇。商代后讲“上帝”，从周朝开始讲天命。天命总与民本相联系，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思想的主流。周公提出“敬天保民”，后来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为神主”之类说法，最典型的是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汉代的董仲舒认为皇帝为人民做好事，就会得到上天支持。当政者只要努力就可以改变天命。我国从西汉以后的封建君主专制一直以董仲舒的“君权天授”为其理论基础，所谓“天子受命于天”（《春秋繁露·顺命》）。其实，权力受命于天和受命于神意义基本是一样的。柳宗元不赞成董仲舒的看法，认为皇帝手中的权力受命于人，“受命于生人之意”（《贞符》）。在柳宗元那里，“生人”和“生民”、“民”是通用的。这样，柳宗元的吏为民之役就有了因果关系。正因为权力来源于“生人”，所以，各级官吏应当是民众的“仆役”，而不是主人。这个论断不但在中国思想史闪烁着灿烂的异彩，而且在世界思想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八九世纪的时候，西欧正处于中世纪，那里的主流理论是“君权神授”，同样是等级制、世袭制的天下。那里无人提出与柳宋元相似的思想。

柳宗元不但主张权力来源于“生人之意”，而且在实践中确实身体力行“吏为民之役”。他被贬到柳州当刺史的四年中，扎扎实实为当地老百姓办了诸多好事实事，如打击买卖人口犯罪活动、解放奴婢、挖掘水井、兴办教育、种树绿化等，以至于柳州人民至今仍然怀念柳宗元、称赞柳宗元的政绩。

柳宗元的知行观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过去，研究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人们往往因为柳宗元没有专门论述知行问题的著作而将他排除于认识论领域研究之外。这是不妥的。柳宗元尽管没有专门著文论述知行问题，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却可以发现他的知行观在同代人中甚至在中国古代思想界中是比较进步、比较科学的。柳宗元文涉及了认识的来源、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对待古人和外人书本间接知识的态度和方法以及认识的目的是“辅时及物”、“利于人，备于事”等，在今天依然有启迪意义。

在中国思想史中，柳宗元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本小册子的六篇文章从多角度做了阐述，不必重复。当然，柳宗元有他的历史时代的局限，他不是完人。在研究柳宗元的时候，必须清醒地把握这一点。

作 者

2013 年 12 月

目 录

吏为民之役

——柳宗元民论研究	1
柳宗元天论研究	19
柳宗元知行观研究	51
柳宗元佛论分析	81
柳宗元政论研究	105
柳宗元文论研究	155
后 记	184

吏为民之役

——柳宗元民论研究

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柳宗元，在青年时代就非常仰慕古代那些有作为的圣人，决心仿效他们，“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①。正是在这种思想激励下，他积极参加了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他被贬谪永州，仍未改初衷。他当时的处境极为艰难，但仍然“无忘生人之患”，并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②。后来，改贬柳州刺史，生活条件更恶劣，他依然努力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兴办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事业，为柳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章士钊先生说：“子厚之尤异者，在主张民为至上，凡事之病于民，或与民无涉者，皆当毁弃。”^③这是颇有见地的。柳宗元的民论思想相当丰富，但是在以往有关柳宗元的论著中极少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须待补救的不足。探究柳宗元的民论思想，不仅对全

① 柳宗元：《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柳宗元集》，第8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② 柳宗元：《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柳宗元集》，第8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③ 章士钊：《柳文指要》，第12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

面了解他的历史观及其全部哲学思想必不可少，而且对恰当地评价他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以至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同样是极有意义的。

柳宗元的“民”的基本含义

柳宗元的论著中使用过“人”、“生人”、“民”、“生民”、“元元”等名词。这些名词中的每一个都有若干种含义。然而，有一种含义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有人民、众人的意思。柳宗元使用这些名词时，多取这种相通的含义。

在《骂尸虫文》中，柳宗元写道：

群邪殄夷，大道显明，害气永革，厚人之生，岂不圣且神欤！

祝曰：尸虫逐，祸无所伏，下民为禄。……尸虫诛，祸无所庐，下民其苏。^①

这里“人”、“民”通用。“民”字前面加一个“下”字，指不当官的老百姓。

《种树郭橐驼传》中讲到“养人术”。其“人”字从作者转述郭橐驼的话中看，是指从事“耕”、“植”、“缫”、“织”等劳作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视民诗》中有“乃学与仕，乃播与食，乃器与用，乃货与通……

^① 柳宗元：《骂尸虫文》，《柳宗元集》，第4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士实荡荡,农实董董,工实蒙蒙,贾实融融”^①的句子。这里的“民”指士农工商。

柳宗元《与杨海之第二书》中说:“伊尹以生人为己任。”^②在《伊尹五就桀赞》中他又说:“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而伊尹四去商汤,五就夏桀,正表明“圣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思德于民”,最后“黜桀尊汤,遗民以完”,不愧为“圣之首”^③。由此可见,柳宗元的“生人”、“生民”、“民”是通用的。

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柳宗元说他早年“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④。在《与杨海之第二书》中,他又说到早年“吾未尝为佞且伪,其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及乎人(一作‘及乎生人’),如斯而已矣”^⑤。在《全义县复北门记》中说:“贤者之作,思利乎人。”^⑥在《兴州江运记》中又说:“安利于人。”^⑦很显然,“利安元元”与“利于人”是一样的含义。“元元”就是人民、众人。

总起来说,柳宗元使用“人”、“生人”、“民”、“生民”、“元元”等名词时,基本内涵都是指人民、众人。在柳宗元那里,与这些名词相对应的概念,有时是“官”、“吏”“长人者”,有时是“圣人”、“贤者”。也就是说,柳宗元的“民”,有时是相对于“官”、“吏”而言,有

① 柳宗元:《视民诗》,《柳宗元集》,第39—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② 柳宗元:《与杨海之第二书》,《柳宗元集》,第8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③ 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赞》,《柳宗元集》,第5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④ 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集》,第7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⑤ 柳宗元:《与杨海之第二书》,《柳宗元集》,第8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⑥ 柳宗元:《全义县复北门记》,《柳宗元集》,第7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⑦ 柳宗元:《兴州江运记》,《柳宗元集》,第7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时是相对于“圣贤”而言。不管是“官”、“吏”，还是“圣贤”，他们都是少数，只有“民”才是大多数。

“民”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柳宗元的民论思想中，极为突出的方面是他比前人较为正确、深刻地回答了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自从我国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朝代的更换，国家的兴衰，君主的废立，构成了一幅幅历史发展的画面。那么，是什么力量决定着历史的命运呢？在柳宗元之前，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天人感应说”和唯物主义的“天人相分说”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天人感应说”认为主宰着人世的是有意志的“天”、“帝”。我国的夏代，已开始有这种思想。《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①在殷人那里，最高的神叫“帝”，“帝”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西周灭殷，说是顺应天命取代殷商的。《尚书》说：“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②我国从周朝开始讲“天命”，而且把“天命”与“民本”联系起来，周公提出“敬天保民”^③，后来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④之类说法。孟子提出“民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 先秦之部 上》，第 68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 先秦之部 上》，第 48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第 7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第 7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为贵”“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无子”^①。成为长期流行的说法。到了西汉，董仲舒创立了“天人感应说”，详细论证了“君权神授”，论证了“天”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唯物主义的“天人相分说”努力从社会本身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原因。在柳宗元之前的著名代表有战国的荀况和东汉的王充。

荀况认为，天和地一样，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界，并不能干预人世的事情。因此，“治乱非天也”。他主张应“明于天人之分”^②，认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社会本身发展的结果。荀况坚持天人相分，反对“天命论”，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认为个别的圣人决定着历史的发展，仍然是一种唯心史观。虽然他也曾引用过前人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话来说明“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③的道理，强调过人民力量的伟大，但这只是在论述如何巩固当权者对人民的统治时迸发的一些思想火花。他并没有正面地肯定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宰作用，而且，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也像自然的天那样有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呢？他也没有明确回答。

王充也是反“天命论”的。在他看来，历史的变迁，不是因为什么“天命”，而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过程。王充把这种客观必然性叫做“期”、“时”、“数”、“天时”、“历数”，等等。他说：“国之存亡，在期

① 《孟子·尽心下》，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 先秦之部 中》，第5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② 《荀子·天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 先秦之部 下》，第1155—11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③ 《荀子·王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 先秦之部 下》，第11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之长短，不在政之得失。”^①“昌衰兴废，皆天时也。”^②“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③王充反对用“天命”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变化，这与荀况是相同的。他比荀况有所前进：一方面，肯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有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不赞成少数圣人能够主宰历史的命运。他说：“世治非圣贤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圣贤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④当然，王充并没有完全否认少数圣人的作用，也说过“圣人之治，即立大功”^⑤。但是，既然社会历史变迁的“期”、“数”不是天意，也不是圣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那么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王充未能作出比较明确的回答。所以，他有时又表现出未能同宿命论划清界限，而得出与“天命论”相类似的结论来。比如，他说：

尧舜之禅，汤武之诛，皆有天命，非优劣所能为，人事所能成也。使汤武在唐虞，亦禅而不伐；尧舜在殷周，亦诛而不让；盖有天命之实，而世空生优劣之语。^⑥

柳宗元继承了荀况、王充等人反天命、反天人感应的唯物主义思想，继续有力地批驳了“君权神授”的唯心主义。在《〈贞符〉并序》中，柳宗元说，不仅董仲舒，而且“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

① 王充：《论衡·异虚》，《诸子集成》，第七册，第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② 王充：《论衡·治期》，《诸子集成》，第七册，第1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③ 王充：《论衡·治期》，《诸子集成》，第七册，第1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④ 王充：《论衡·治期》，《诸子集成》，第七册，第1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⑤ 王充：《论衡·齐世》，《诸子集成》，第七册，第1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⑥ 王充：《论衡·齐世》，《诸子集成》，第七册，第1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诋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柳宗元赞成荀况关于国家权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适应人民需要，为解决人民之间争夺物质生活资料问题而产生的思想，但不赞成荀况关于少数圣贤主宰历史命运的观点。柳宗元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非圣人意也，势也”^①。柳宗元的“势”同王充的“时”、“期”“数”有相同之处，然而又比王充进了一步。他把决定历史命运的“势”归结为“生人之意”，归结为人民的力量，这就避免了王充那种有时又与“天命论”划不清界限的错误。

在《〈贞符〉并序》、《封建论》、《天对》等著作中，柳宗元反复论述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宰作用。

一方面，柳宗元用大量事实说明，新王朝的建立、兴旺，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屈原在《天问》中问道：“登立为帝，孰道尚之？”登上帝位当帝王，是谁推荐和尊奉的呢？柳宗元在《天对》中答道：“惟德登帝，师以首之。”^②只有有德的人才能称帝，是众人推举他的。柳宗元认为，从黄帝、尧、舜、禹、汤至文武，他们得天下，是由于“德治”，取信于民。汉朝能立，是由于“克怀于有氓，登贤庸能，濯痍煦寒，以瘳以熙”^③。唐王朝能兴旺，是由于“丕降霖雨，濬涤荡沃，蒸为清风，疏为泠风”。所以，“人乃并受休嘉，去隋氏，克归于唐”^④。柳宗元的结论是“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⑤。

① 柳宗元：《封建论》，《柳宗元集》，第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② 柳宗元：《天对》，《柳宗元集》，第3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③ 柳宗元：《〈贞符〉并序》，《柳宗元集》，第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④ 柳宗元：《〈贞符〉并序》，《柳宗元集》，第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⑤ 柳宗元：《〈贞符〉并序》，《柳宗元集》，第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另一方面，柳宗元又深刻地揭露了旧王朝的衰败是由于他们没有实行仁政，遭到了人民的反对。屈原在《天问》中问，上帝把天下交给殷商治理，在王位上应该怎样使用自己的权力？上帝让殷朝建立又让它灭亡，殷朝究竟有什么罪过呢？（“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柳宗元在《天对》中答，王位是用来保护人民的，有仁德的人才能登临。殷纣王极其荒淫，残害百姓，所以众人要推翻他，杀死他。（“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纣淫以害，师殛殿之。”^①）在《〈贞符〉并序》中，柳宗元认为，魏晋以下，以至隋朝，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使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失去了民心，不能不灭亡。

柳宗元从大量历史事实中得出结论：

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②

柳宗元的这种思想与孔子的仁政思想，与孟子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思想，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生人之意”又是由什么决定的？柳宗元没有回答，也根本不可能回答，不能将柳宗元的“势”，“生人之意”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相提并论。但是，应该看到，柳宗元肯定历史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肯定人民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是难能可贵

① 柳宗元：《天对》，《柳宗元集》，第3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② 柳宗元：《〈贞符〉并序》，《柳宗元集》，第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在柳宗元之后的,哪怕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少有超过柳宗元的。王夫之的“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而吉凶应之”^①,也不过是对柳宗元的“生人之意”稍做了一些发挥。而王夫之同时还有视老百姓为禽兽的见解:“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②这显然远不及柳宗元了。

吏民关系

柳宗元对吏民关系的论述在他的民本思想中同样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柳宗元从青年时代起直到晚年,始终怀抱“利民”思想。这是他的理想以及他在政治舞台上从事各种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柳宗元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③

怎样“利民”呢?柳宗元的思想有个发展过程,大体可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永贞革新失败前,柳宗元主张各级官吏、“长人者”应懂得“官理”“养人术”。在柳宗元出生前18年,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爆发了长达近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柳宗元9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柳宗元13岁时,曾随父亲柳镇到过长沙、九江一带,接触了人民的生

①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天道篇》,第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② 王夫之:《俟解》,《思问录 俟解》,第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③ 柳宗元:《时令论上》,《柳宗元集》,第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活。21岁时，柳宗元考中进士，登上仕途。但同年五月，他父亲去世。柳宗元在服父丧期间又到邠州（今陕西省彬县）探望叔父柳镇，在那里居留了两年。在此期间，柳宗元广泛交朋纳友，进一步了解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深为唐王朝的急剧衰落而焦虑。他感到，如不结束战乱频仍的局面，不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条件，势必导致唐王朝的灭亡。因此，柳宗元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极力宣传“官理”、“养人术”。《种树郭橐驼传》和《梓人传》集中地表达了这些思想。

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柳宗元批判了那些“好烦其令”的官吏。柳宗元认为，这些官吏尽管心是好的，也想为老百姓做事，使老百姓得到好处，但由于“好烦其令”，结果使老百姓吃了苦头。柳宗元借郭橐驼之口极其生动地说明，种树要“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养人”要使老百姓蕃生安性。

柳宗元不仅提出官吏本身要讲求“养人术”，以达“利民”之目的，而且提出了使用官吏的基本原则。在《梓人传》中，柳宗元从一位不会干木匠活却善于指挥其他木匠干活，建造出精美房屋的梓人（即木匠、建筑工）的行动联想到管理国家。柳宗元说，治理天下的根本是要靠人，因此，辅助皇帝的宰相，第一，要整顿纲纪，整顿法制。“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①第二，要善于用人。柳宗元提出的用人原则是“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②第三，柳宗元主张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让他们各

① 柳宗元：《梓人传》，《柳宗元集》，第4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② 柳宗元：《梓人传》，《柳宗元集》，第4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